



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

刘 顺◎著



ZHONGTANG

WENRUDESIXIANGYUWENXU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34362

B222.05
125



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

刘顺◎著



ZHONGTANG

WENRUDESIXIANGYUWENXUE



北航

C172268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222.05
1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刘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304-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唐代②中国
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B222.05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91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许继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胡晓明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偏处处。东西南北皆欲往，
千山隔兮万山阻。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
三杯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韩愈《感春》）

正如史家所指出：安史乱后，中国社会由开放与向外，转而内敛。社会危机因素麇集于内，一直难以自我调适。藩镇、宦官与朋党，成为中央王朝试图弥合而终未能的离心之力；其他诸如社会奢靡崇尚与城乡沟壑、士人的结党营私与功利取向、复杂的地域、宗教、族群间的认同冲突，以及知识传承与意义生产的典范转移，更内在深切的士人内心深处修行与随俗、虚矫与真实、内外与本末、绝望与希望等多种因素此起彼伏、互为因果，激化了民族及个人身体与灵魂的多重危机。盛唐时代所积累的正能量，诸如文质相炳焕的文化理想、倾全力经营西北的目标方略、开明尚贤的政治制度、开放进取的士人生命，以及合内外本末为一的儒家文化之刚健精神，在新的时代脉络里，终于面临重大挑战。

刘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初盛唐的儒学与文学》之后，余勇可鼓，又续写了更复杂而波澜起伏的中唐。他进一步在更大的知识领域发展了他在博士论文中的焦点论述，即：“文儒”，如何成为文学与思想的接口。这回，他自设了一个重要命题：在新的时代危机面前，文儒的成立如何可能？

在我看来，刘顺找对了题目。接下来的中唐，确实使“文儒”更加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中唐文学的珍贵价值即在于它所承载的独特的思想，即文儒们回应危机的心态、观念、生活方式与艺术。这些珍贵价值不应只是成为一种文学的社会背景，像我们原来在大学里学文学史时所说的那样，作为文学的外在世界而谈论。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与文学论述中，总是过多强调了这样一种历史的背景与历史诸多因素及情境的必然与本然，过多在文学史著中铺叙了文学家与文学现象如风随影的被动演出，而忽略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一个主人，即作为文学家的“思想”的主体，是如何主动参与历史、调适文学、建构意义的。“思想”没有作为一个叙述的主体，亮相出场。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写的《先秦文学思想研究》的小引里，我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几乎没有人怀疑，了解文化史、思想传统，对于了解文学史的必要性了，但是本书的写作方法依然显得有点特别。一般只当作背景、前提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这次索性进到里面去，成为本书的主题，真正的主人大大方方出场了。……本书企图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先秦文学，并非想为先秦文学争取更大的地盘，而是深知只有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照明先秦文学里头的活的精神生命。我总固执地相信，研究中国文学的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化思想的中心，一层一层透出去，而不应只是从分散的文体、语言、风格、作家的研究，再慢慢地综合起来。没有思想的文学，只是僵死的文学、幽暗的文学……（《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小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当时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而今天这番话拿来品题这本书，却也以为恰当自然。刘顺做到了“思想”作为主体，大大方方地出场，做到了从文化价值的中心，一层层透出去，也做到了真正以此照明中唐文学的活的精神生命。

这就是我读来十分振奋的地方。我从近年来像刘顺这样的不少年轻学

者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学研究，如何提炼问题意识，如何真正一步步走出五四新文化对文学精神生命遮蔽的种种努力。

再回到文章开头引的韩愈那首诗。

韩愈的《感春》诗，像做梦一样向往着一个春花满园、百鸟鸣啼的所在，却万千阻隔难往。在晚清，这首诗也同样引发了不少心灵敏锐的诗人士子的深切感动。据《石遗室诗话》载，辛亥前一年，即1910年，在北平，陈曾寿与徐思允、傅岳棻、许宝蘅、杨熊祥等人，组建诗社，各有和《感春诗》多首。陈曾寿的一首是：“春之来兮自何所？雪渐冰泮兮悲故处。众人熙熙登春台，欲往从之意忽阻。今我不乐诵书史，其骨已朽空自语。骄气淫志何益身？漫掷幽忧付来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很有新意的和诗里，不是春之易逝引发感伤，也不是春花胜景阻隔难求，而是“春”之来自何所，成为一个颇为值得疑问的问题；在众人熙熙、不加思索地登春台的时代潮流面前，诗人迟疑，欲往却回、先迎后拒，一团迷乱与困扰。尽管“春”未来之前的“故处”，使人依恋，教人缅怀，然而其骨已朽，尽是骄气淫志，也无益于身心的安顿。这首感春诗所表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晚清士人心态：对旧物故人的顾盼守护与渐失信心，对新事新理的疑惧交加与爱恨重叠，“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而1910年春天的北平，大革命前韩愈诗学的激活，无疑点亮了晚清士子回应时代巨变的心绪闪爆。

然而无论陈曾寿的晚清感春与韩愈的当年感春有何不同，其基调是相同的：“我所思兮在何所？”即如何在一个迷乱的时代，安顿身心，止泊灵魂？刘顺分析韩愈的上引诗中“一生长恨”：

自然是人生道路选择的自我质疑。虽然，在唐人乃至更早的儒者那里，如此的质疑与痛苦屡见不一见，但在类型化的情感传递中，却难掩儒者在面对出处、行道与挫折、理想与现实等问题时，追问而不得其路的痛苦与焦虑。儒者如何在挫折中调整安顿自我而又不失儒者情怀？如何在“货与帝王家”之外，另辟出路而又能彰显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卑之无甚高论，因其根本，而尤难回应。幽怀难遣的诗人，

只有在杯酒醉乡中才能忘却当下的身份，暂获解脱。

我这样一边读，一边联想到韩愈身后两千年的陈曾寿感春诗，想到其中所包含的未能明言的心境与意念，这样去探测诗人文学家的“思想”，有意义么？

文学与思想是什么关系？我们常常看到某种认识论的理解，文学受思想影响而形成某种思潮，如古文运动形成某种宗旨，如文道合一，或者文学观念形成一些诸如文质、形神、意境、尚奇、求怪等现成的理论或美感范畴，但是我更欣赏刘顺在这本书里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安顿身心”。“文学”是一些活生生的人，“思想”也是一些有温度、有感应的心灵，作存在的探询与人生的理解。尤其是文学家如此敏锐深情，在招架来自历史时代各种主要的力量，在回应一个破裂世界的种种冲突时，他的身心所遭受的苦痛与自我疗治，一一透过文字，将这一过程写下来，展示给自己，也告诉我们这一身心自我复苏与疗治的过程。

所以，我读这本书的另一个感受是，我没有看见作者囿于现成的思潮或范畴，而是潜入中唐文儒安顿身心的体验与写作的艰难过程之中，很深很广泛地潜入，从政治的争斗、军事的烽火、经济的账本、礼乐的钟鼓，到服饰、宴别、墅园、山林、乡村，与语言、文章、意象……大场面与小镜头，群像与特写，气场全幅徐徐展开，有一种与时代思想感同身受的共振。其中的“思想”具体而真切，包括：社会、伦理、思想，一层比一层深切的危机是如何包围着中唐文儒群体的？外儒内释道二元化的中唐士人思想方式是如何成为一种笼罩身心的存在焦虑？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同样体验与政治中心离异的区隔感受，然而因人而异的表达又经营着什么样的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生命反思？创造了什么样的空间体验诗意？韩愈、李翱以何种姿态与方式超克士人立身处世本末内外破裂的时代难题？宋儒接受韩愈的过程为何“孔颜之乐”逐渐成为主要的观照视角？等等。在作者的笔下，“中唐的文学与思想”这个命题，一点点面目清晰起来，鲜活起来，从僵硬现实的套套中走出来，从向来的思想是思想、文学是文学的人为区划中走出来，走向一种新的融合。

这就是我从这本书里感受到的第二个欣喜的收获。

最后，从陈曾寿与韩愈感春诗的对话中，我想起陈寅恪，想起他关于宋代文化的一个大判断：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同上引，《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刘顺《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与逻辑归宿，正是陈寅恪先生的这个思想。由盛唐之浪漫高华，中经中唐的时代危机，终于在宋代重建华夏人文世界之庄严高贵与美妙，知识人心灵由此而得到身心安顿与灵魂止泊。如何真正消化外来文明，如何圆善地解决本末内外的分裂，更具体的，知识人如何不自卑又不狂妄，皆是为中古中国与现代中国共有的大课题。这样一来，中唐之中，百代之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思想的信息，又岂是中唐本身所限，又岂是文学辞章小道所有？而“我所思兮在何所？”的唱叹生情之中，所包含的生命体验与想象、憧憬、苦痛、希望，又岂是韩愈或陈曾寿们所特有？至于全书内容细节之丰富与启示，此区区序文，又不及其万一也。

2013年1月18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中唐的全面危机	(4)
第一节 中唐的政治危机	(5)
第二节 中唐的社会危机	(22)
第三节 中唐的思想危机	(39)
第二章 中唐文儒及其诗文新变	(60)
第一节 中唐的三大文儒群	(61)
第二节 文儒诗文的文化精神	(84)
第三节 文儒与中唐的诗文新变	(106)
附录 钱钟书论韩愈	(132)
第三章 文儒的危机应对及其生活世界	(158)
第一节 回向自我:中唐文儒的危机应对与儒学转型	(159)
第二节 典范的变改:中唐文儒的历史记忆之书写	(178)
第三节 空间的区隔与重建:中唐危机下的韩愈	(196)
第四节 个体记忆与文化生产:柳宗元的南方生活 ——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216)
第五节 歧路的逍遥:白居易的“中隐”	(238)

第四章 思考的延续:宋儒的“孔颜之乐”	(256)
第一节 宋儒的韩愈接受	
——以“孔颜之乐”为中心的考察	(256)
第二节 宋儒诗中的身体书写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274)
结语	(294)
参考文献	(297)
后记	(315)

绪 论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施追问桥上的庄周。

“我知之濠上也。”庄周回答好奇的惠施。

是运思不足，故而回避问题；还是智者的高明，直循其本，姑且不论，生活于此间者又何尝能跳脱此问。我生于今之世，又如何能理解已沉入历史千年之久的唐人？如果说，庄周知鱼之乐，乃因“共同的濠上世界”；我与唐人的“共同世界”又在何处？你我既知历史本不可还原，为何又总有还原的冲动？在还原中被理解的是历史，还是生活于当下的你我？也抑或理解历史，也即理解你我；理解你我，同样也即理解历史。那么什么又才是历史？^① 钱穆先生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如此，又是否可以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个体或群体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但是什么样的人 and 事，才会成为“忘不了的人和事”？特别是对个体而言，若非家族记忆，故纸堆与器物群中又如何才能有“历史”？不惮于屡照的明镜，足纳万象；可明镜并无所谓的真生命，也自无所谓的自我的“历史”——“忘不了的”惟因真实的关切而可能。对于个体而言，其所谓的“历史”，也即其所关切的过往时间之河中的人物与事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若把上述四种含义概括起来，结果就是：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在格外强调的意义上被当作历史的则是：在共处中‘过去了的’而却又‘流传下来的’和继续起作用的演历。”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9页。

件。可历史中的人物所以成为如此这般者，要因其所“经历”的历史。那么，如何方能贴近历史中的人物，与其“共有一世界”？此外，当个体之关切不止步于情感的投射、而相关于历史之“真”时，“真”又何如可能？

中唐为中古向近世转向的节点，自是当下文史研究界的常识。但习以为常的表述背后，却总藏有一两分的遮遮掩掩，令人心生疑窦。“中唐”为百代之中，可作为历史转折的关纽，其集大成的美富与启后世的新奇又在何处？如何才能真正地将“大文学”的视野化入有唐的文学研究？至少在今日的文学史研究中，如此的追问，似乎尚非门外者的强词夺理。“中唐是变革的时代”的预设，必然会引发环环相扣的诸多问题。然而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常常会发现基础理论间的相互错位。任何一概念的产生与发生效应，总因其背后的概念群——也即相关理论的支撑。以“中唐为百代之中”的预设而言，为其奠基的理论框架当为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或相近之理论表述；但熔“转型”与“封建”于一炉而得心应手者，自不乏其人。“历史”固然总是观照者眼中的“历史”，也即某种理论视野中的“历史”；但两重镜片的叠加，恐只能去历史真相愈远。文学史研究当直面“哲学的挑战”，这既表现在选择“观察格栅”时保持反思的清醒；同样也表现为面对具体研究对象时，理论素养的提升。对于试图以“大文学”之理念研究有唐文学而言，解读作为思想的文献，与理解作品、人物乃至时代思想脉络实为同一过程。当解读者无法进入文献的思想世界时，自然无法了知古人的关切，从而隔膜于其运思所欲回应的问题。由此，与“古人共有一世界”的期待，也自成虚语。此外，今日的文学史研究也当直面“历史学的挑战”。此首先表现为，文学研究对于“历史感”的清醒，平衡理路的把握与语境的还原，避免过度追求“通识”而“蹈空”。在此点上，文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似乎有天然的亲近之处。^① 而历

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哲学史家关于‘道体’的现代诠释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学的全体而言，至少已经历了两度抽离的过程：首先是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中抽离出来。至于道学家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则自始便未曾进入哲学史家的视野，今天一般读者对于道学的认识大致都是假途于哲学史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

史感的清醒，也是文学研究保持其族群性与地方性的要件之一；^①其次，则表现为对于历史学基本理论与知识的接受。文学研究无法不把自身放入更大的学术共同体中，因而，对历史学动态的追踪，既是文学研究推进的助缘，也是文学研究赢获尊重的保障。“知人论世”的追求，只有在不断直面挑战的自我更新中，方始可能。^②

中唐的三大文儒群^③是中唐时代危机的经受者与反思者，故而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追寻中唐的危机，便成为理解中唐文儒的起点。但自唐宋转型的大判断而言，如若没有深度的历史危机，一场暴乱自不能导致由唐而宋的巨大转向。危机的深度是潜在的思想的高度，投身于时代变局中的中唐文儒参与思想运思的动力何在？其可资利用的资源何在？身处动荡时代的个体有何种遭际与体验以及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如何可能并呈现出何种样态，则成为思想自我实现的真正标尺。在中唐研究成果迭出且佳作不断的现状之下，选择中唐文儒为研究对象，只因笔者在试图根据一己之阅读经验重构中唐之思想地形图时，尚有不可或缺的空白之处。当自我的关切让中唐挥之不去时，尝试在中唐文儒的问题关切中寻获贴近文儒的可能途径，并进而在情感与思想的“一体之感”中与文儒“共一世界”，也即成为选题看似恰当的理由。虽然，关注长时段的思想变迁并考察其与文学之关系，不免“浮虚”之弊；但如此的考查，也是笔者试图回应哲学与历史学挑战的一次尝试。思之能力有限，或许不损思之真诚。

① 刘文勇《历史学对于中国文化与文论研究的挑战》：“中国文论和总体的中国文化一样，向来有一种‘卑之无甚高论’的姿态，而大多注重于‘见之于行事’的践行践履的态度，但这‘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说和态度经过学者们‘超历史’的方法一研究，似乎基本上都变身而成为类似西方的‘高论’了。在中国文化中谦卑之论往往就是‘高论’，那些‘放言高论’者往往是‘低论’而已，孔子‘述而不作’的低调心态，使得孔子言论反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中国几千年就是明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十六届年会暨杨明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9 年，第 243 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6 页。

③ 关于“文儒”概念的考查，请参见刘顺《初盛唐的儒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三章第一节的论述。在本文中，“文儒”意指具文章之才与儒者情怀且参与儒学问题之讨论者。

第一章 中唐的全面危机

在难以走出历史周期律的传统中国，一场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的武装叛乱，似乎只是帝国肌体上的某次阵痛。即便它最终决定了帝国的存亡，也很难真正成为历史转折的风向标符。但在中唐为百代之中的大判断之下，持续时间不足十年的安史之乱的历史意义却超出了特定境遇的囿限，成为传统中国由中古向近世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乃至日常生活在此危机之后的数百年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发生了重大变化，^①近世异于中古的诸多特征逐步呈现，并渐成主流。虽然唐宋之间依然存有难以割断且脉络分明的连续，但醒目的断裂却不断彰显着中唐的历史位置，安史之乱因为撞开了中唐的大门，也由此具备了特定的历史意义。历史的重要分期通常包含了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型，而此种转型之所以可能的思想新创，却又必因特定时代的社会危机而可能，故而历史转型也即可以认定为危机应对的产物。安史之乱，打破了唐人书写中近乎梦幻的大唐盛世；但更为重要的是，进入中期的唐人开始被迫去面对复杂而急迫的时

^① 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或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另一个原因却相反，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唐宋历史的断裂，从很早以来就有人意识到唐和宋的不同，但大多是直觉把握或笼统感受，并没有理性地提出可供分析的框架，直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才根据西洋史的理论，明确地提出一种理论，把唐算作中古的结束，而把宋看成近世的开始。从其引起诸多争议的《支那论》和《唐宋时代的概观》看，唐代还是贵族社会，而宋代是君主独裁与平民主义的社会，晚唐五代是一个过渡期。从唐到宋，前后两个时代，一切都不同了。所以，唐宋成了中古和近世的分水岭。这种意见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后来他的学生宫崎市定更把这一说法具体化，补充了许多方面的证据，而且很多人凭着读史的经验，更提出来以安史之乱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看法。在中国，像陈寅恪《论韩愈》就是这个看法，钱穆《唐宋时代的文化》也是这个看法。”《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代危机，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动身时刻。

第一节 中唐的政治危机

传统社会的朝代更迭，虽表现形式或有不同，然根底细究，则不外社会运行成本过高与异己势力坐大两因。此两类原因又常交互并行，加速某王朝的衰亡——中唐皇室的危机与唐之终亡于10世纪初自莫能外。安史之乱击破了盛世的迷梦，潜滋暗长而又被盛世表象所隐盖的诸多矛盾随之暴露于公众眼前。若为论述方便计，对中唐君臣所面对的危机作便宜分梳，则可目之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思想危机，而以政治危机为核心。在时人的论述中，中唐的政治危机主要与藩镇、宦官与朋党关联颇密。虽然，传统王朝因其自身性质故，无法真正有效解决影响其存亡的两大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跳脱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但中唐君臣的危机应对，在深度影响唐人生存状态并相应延长了李唐国祚的同时，也为后来之宋明社会的制度设计与思想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中唐”作为百代之中的历史地位，也自奠基于此。因而，对中唐之际的政治危机略加梳理，遂成为进入中唐历史语境、同情了解中唐文儒时代运思的必由之径。

—

唐代前期的藩镇本为备边而设，多在边地，唯河东一镇治所太原，较居内地。民族关系与力量消长的变化及府兵制的消亡，逐步破坏了初唐以来“居中以驭天下”的军事格局，故而十节度使的设置，已暗成中唐危局。^①

^①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也。”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28页。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二：“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别有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捉，亦皆边也，而权抑轻。若畿辅内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兖、泗、魏、邢，咸弛武备，幸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旦夕之无虞，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67页。

及安史乱起，玄宗于仓皇幸蜀途中，颁布《幸普安郡制》^①，扩大藩镇设置区域及藩镇权力，藩镇林立之势自此而起，藩镇遂成为影响李唐命脉的重要因素之一。“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②唐代中后期林立的藩镇，据其与中央王朝的动态关系，又可有不同类型的划分，^③大体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整体格局。^④但相对追求权力集中的传统王朝而言，游走于叛逆与顺服之间的藩镇，自然是一种颇值警惕而亟欲消除的异己力量，唯因中唐内部及民族间关系错综复杂，中央政府不得不依赖于以藩镇牵制藩镇的便宜之策。在有唐中后期的政治论述中，藩镇问题之处置，几成大唐中兴与否的量度界尺。当下的唐代藩镇研究已无早期过于平面化之缺欠，而能较好地还原当日藩镇存在的历史原景。然置身事外的条分缕析虽客观而深入，却不免隔膜于唐人是时的生存体验。毕竟在中唐语境中，相关藩镇的体验与表述夹杂唐人太多的危机感受。

① 贾至《元宗幸普安郡制》：“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岷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刘洸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大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魏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乞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三六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19—3720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四四二《尹源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83页。

③ 张国刚主要据所处地域将唐代藩镇划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与东南财源型四类（《唐代藩镇研究·序》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王寿南则据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将其划分为跋扈型、恭顺型和叛逆型（《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版）；王援朝据藩镇对朝廷的政令执行、官吏任免、财税征集的不同，将其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与南方财源型。（《唐代藩镇分类刍议》，《唐史论丛》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29页）

④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序》：“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后期近五十个藩镇中，真正割据的主要是河朔型藩镇，宪宗以后，基本上只有河北三镇而已，其余中原、边疆、东南藩镇都是不割据的。东南藩镇则具有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作用。这样，河朔镇与中原镇在割据与防割据的相持关系上、中原镇与边疆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镇、东南镇与中原镇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整体结构，并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地统一了一百年。”（《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去中央化”是藩镇存在对于李唐王室的首要威胁。德宗建中三年(782)，朱滔、田悦、王武俊等数人同时称王，自称孤或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①在“唯名器不可假人”的传统中国，朱滔等人更改名号的行为，乃是对大唐君臣秩序的公然僭越。但面对诸藩肆无忌惮的挑战，大乱之后的中央政府似乎并无有效的应对方略。同年十二月，李希烈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建中四年，朱泚在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拥戴下，驱逐德宗，并自称“大秦皇帝”，李唐皇室已处风雨飘摇之中。虽德宗最终收复长安，但朝廷之外，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亦逐步成型：

贞元十年以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阊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络绎，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阁，甚者碍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②

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渐成割据之态，虽名义上仍认同李唐王室，但军事权、人权、财权、观察处置权均为己有，迄唐亡一百余年，河北藩镇即以中央政府言亦目其为化外之土。因安史之乱所设之中原诸镇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62页。

^②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53页。